

中东世俗化的阶段及特点^{*}

李福泉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 中东世俗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世纪到一战, 为世俗化的起源时期; 一战到二战, 为大规模推进时期; 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 为深化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为“反复”时期。中东世俗化有四大特点: 第一, 外力驱动, 被迫进行; 第二, 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动; 第三, 世俗化的结果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化; 第四, 历经反复与挫折, 面临重重困难。如何协调和平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依然是中东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关键词: 中东; 世俗化; 伊斯兰教; 土耳其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0)01-0075-05

对于何谓世俗化, 学术界向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 “世俗化就是宗教的作用和约束力不断‘衰退’和‘减弱’的过程”^{[1]16}。宗教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与法律相分离以及宗教与民众教育相分离是世俗化的三个主要内容。多数学者认为, 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是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世界各主要文明体系世俗化的表现不同, 形态各异, 作为伊斯兰文明核心的中东地区, 其世俗化便独具特色。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 与其他地区相比都有所不同。

一、中东世俗化的阶段

自19世纪初期, 中东(不包括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地区也开始步欧洲后尘, 进行世俗化的变革。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到一战, 为世俗化的起源时期。中东地区的世俗化肇始于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改革。自18世纪起, 由于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接连失利, 奥斯曼帝国被迫进行改革。1839年, 坦齐马特改革启动, 世俗化成为坦齐马特时代(1839~1871年)的一个重要特征。帝国按世俗需求进行立法, 1840年和1850年, 带有世俗特征的刑法和商法先后产生, 随之而建立的世俗法庭以此为依据审理案件。^{[2]160-164}与此同时, 世俗教育快速发展, 世俗教育体制形成。世俗学校脱离了乌里玛控制, 由教育部门管理。^{[3]138}

阿布杜·哈米德统治时期(1876~1908年), 教育和司法改革继续推进。1909年, 青年土耳其人夺权后, 帝国的变革速度进一步加快。现代行政管理机构建立, 世俗法律的范围扩大, 新型的现代教育体系形成,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大规模传入, 服装和生活方式出现明显的欧化倾向。

随着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推进, 其统治下的“新月地带”阿拉伯地区(今日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也受到影响, 世俗力量逐步增强。在北非的埃及, 自19世纪初期以来, 穆罕默德·阿里与其子孙也大力推行欧化改革。统一的世俗国民教育逐步发展, 欧式国家教育系统得以确立。法国式的民法典和

收稿日期: 2009-07-15

作者简介: 李福泉(1978-), 男, 甘肃兰州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东问题和伊斯兰教。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东局势发展及我国战略对策研究”(04&ZD021)的阶段成果之一。

刑法典付诸实施,非宗教法庭普遍建立。

虽然这一阶段的世俗化历经约百年时间,但其最终成果却十分有限。由于世俗思想仅仅得到少数精英的支持,改革运动遭遇重重障碍。还有,改革自身深度相对有限,只触及政治、法律和教育层面,主观上还没有尝试解决深层的思想文化问题。到20世纪初期,伊斯兰教作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依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虽然这时宗教对司法和教育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却形成了世俗机构与宗教机构并存的格局。不过,这一阶段开启了世俗化改革的序幕,培养了一些类似凯末尔的世俗精英,扩大了世俗思想的影响,这为后继的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阶段从一战到二战,为世俗化的大规模推进时期。随着一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现代土耳其兴起,阿拉伯各国除沙特等国外均处于英、法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与此同时,阿富汗反英斗争取得胜利,伊朗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实现了政治稳定。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强劲的变革之风吹遍中东各独立国家,而其中以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国的改革影响最大。

以凯末尔改革为标志,土耳其成为中东现代化潮流的先锋。在一定意义上,凯末尔改革是19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改革运动的继续,但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奥斯曼帝国改革运动。世俗主义是凯末尔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世俗化是其鲜明特征和核心内容。政治方面,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了政教分离的土耳其共和国;法律方面,废除宗教法庭,制定新宪法、新民法和新刑法等法律,使法制彻底脱离了伊斯兰教的控制;教育方面,停办旧式的独立宗教学校,统一全国的教育体制,规定所有的教育机构都隶属教育部。此外,凯末尔还在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进行了世俗化改革。经过近20年的激烈变革,土耳其结束了宗教与世俗机构并存的局面,世俗机构就此一统天下。

凯末尔改革在中东引起了连续性的反应。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伊朗礼萨汗和阿富汗阿马努拉以凯末尔为榜样大力推行具有世俗化性质的改革。与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不同,礼萨汗的改革在君主体制下进行,但在法律、教育、社会、宗教管理等方面同样采取了一些世俗措施,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4] 12}。礼萨汗从土耳其移植了许多观念与做法,建立了现代司法和教育体系,使得法律和教育基本脱离了宗教的约束。乌里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宗教界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20世纪20年代,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也大张旗鼓地实行世俗化改革。他强制性地剥夺毛拉在政治、经济、司法和教育等领域享有的特权,推出婚姻法,废除多妻制,限制妇女戴面纱,禁止穿民族服装并实行男女混合教育。由于他不顾本国实际而生搬硬套土耳其和伊朗的经验,以致改革最终失败。

上述三大改革运动均是由具有世俗思想的政治人物掌权后一手推动的,但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领导者的能力与素质各异,改革运动的命运不尽相同。凯末尔改革成功使土耳其成为当时中东最具活力的穆斯林国家,礼萨汗改革尽管促进了伊朗社会发展,但却使王权与乌里玛分道扬镳,而阿马努拉改革随着他流亡他国,成果几乎荡然无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改革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城市,世俗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穆斯林构成改革的主要群众基础。由于对伊斯兰传统的态度不同,城市与乡村、知识界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思想裂痕,这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在埃及和新月地带,世俗化步伐也继续迈进。英法殖民者从经济和行政上控制伊斯兰教势力,根据欧洲模式对穆斯林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革和限制。总体而言,世俗教育扩大,宗教教育萎缩,世俗法律成为国家法律的主体,乌里玛被进一步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但由于英法殖民者的掣肘等原因,并没有出现土耳其式的大规模社会变革,但世俗力量总体上呈逐步壮大之势。

第三阶段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为世俗化的深化时期。二战后,埃及、伊拉克等国家先后完全独立,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中东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巨变时期。随着城市化和现代教育的发展,世俗思想迅速扩散。无论在君主制国家还是在共和制国家,世俗化都进一步推进。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东的君主制国家包括伊朗、阿富汗、约旦、伊拉克(1958年以前)、也门(1962年以前)、沙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宗教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巩固世俗政权的优势地位,推进现代化改革,但与中东共和制国家相比,其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保守性^{[4] 155},宗教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中以沙特为典型代表。

各君主制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了以世俗体制为主的政权机构,宗教机构融入其中并服从于前者。

沙特和也门虽然实行严格的政教合一制度,但国王握有最高的决策权。各君主国一般都创立了与宗教法院并存的世俗法院体系,处理伊斯兰教法涉及不多的司法事务。吸收西方的法律原则,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要的立法渊源,制定商法和涉及现代生活的各种法规。除沙特外,君主国制定了民法、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约旦和伊朗等国还制定了婚姻法,对多妻制和男性的休妻权予以废除和限制。随着社会改革的进行,妇女地位提高,就业面扩大,许多人进入教育、医疗、行政、金融、工业等领域。为了适应需求,各国都大力发展现代世俗教育和女子教育,创建新型的现代世俗学校。宗教教育虽然得到保留,但被大幅度改造,专业和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实现了现代化。

二战后,除土耳其之外,原有的共和制国家叙利亚、黎巴嫩和民主也门等已经独立,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也门(1962年)等国相继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与前述君主国不同,世俗主义成为其立国的思想基础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指导思想。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尽管不排除伊斯兰教,但都以世俗主义为突出特征。共和制国家对内政策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改革的世俗化水平远远高于君主制国家。由于宗教机构毫无例外都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出现大批领取薪水、为政府服务的官方乌里玛。司法体系得到彻底改造。埃及等国废除了宗教法庭,建立了单一的世俗法庭。各国均颁布了以西方法律为主要渊源,同时不同程度吸收伊斯兰法内容的世俗法律,包括民法、刑法、婚姻法和家庭法等。妇女地位大幅度提高,就业领域空前广泛。世俗教育和女子教育迅速发展,宗教教育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变。与君主国采取的温和措施不同,共和制国家的世俗化改革相当激进,伊拉克等国甚至以暴力强制推行。这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这些国家政局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一阶段,世俗主义在整个中东的影响达到顶峰,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卷入世俗化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普遍受到世俗化的冲击。虽然伊斯兰教依然是穆斯林的共同信仰,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出了中东国家的公共生活。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中东世俗化遭遇巨大挫折。

第四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为世俗化的“反复”时期。二战后,中东各国推行的世俗化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反而使穆斯林陷入了认同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宗教,寻求发展和复兴之道。在民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在20世纪上半期便已诞生。1967年“6·5”战争的失利,直接推动中东穆斯林国家向伊斯兰教回归。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则使中东世俗化进程出现史无前例的大逆转。作为一场历史性的事件,伊朗革命在中东国家揭开了伊斯兰复兴的序幕。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程度不一的伊斯兰化成为中东的普遍现象。许多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中加入尊重伊斯兰教的条款,并强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伊斯兰色彩。民众的宗教意识大幅度强化,各国伊斯兰运动蓬勃发展,有些极端的伊斯兰组织甚至试图通过暴力推翻世俗政府,建立伊斯兰政权。1979年的麦加禁寺事件和1981年萨达特遇刺便是此方面的典型表现。在中东,伊斯兰教转守为攻,世俗主义处于全面防御的态势。与20世纪前半期不同,这时谈论世俗主义甚至都成为敏感的话题。^{[5]17-19}

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东又迎来了第二次伊斯兰复兴的浪潮。埃及、伊拉克等政府都程度不同地推行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政策,以获取宗教合法性,民间伊斯兰运动更加活跃。在阿富汗,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建立了又一个伊斯兰政权。2003年以来,借助民主选举,伊斯兰组织的力量又呈扩大之势。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强势崛起,在2006年的立法委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土耳其,具有强烈伊斯兰色彩的正义党和发展党分别在2003年通过选举成功上台。

然而,伊斯兰的复兴绝不意味着中东回复到了宗教社会。历经近200年现代化的冲击和世俗化的变革,伊斯兰教在中东总体上已经不再是支配性的意识形态。除伊朗之外,共和制国家世俗政权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世俗教育是人们受教育的主要形式,世俗法律和法庭主宰着司法系统。在沙特这样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国王实质上依然作为世俗君主实行统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也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趋向。阿富汗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又重新建立了世俗力量主导的政府。世俗化虽有反复,但其影响已无法消除。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冲突、交织与并存成为中东的独特现象。

二、中东世俗化的特点

由上述可知,自19世纪以来的世俗化进程,已使中东国家的教俗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与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方国家相比,中东国家的世俗化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一,外力驱动,被迫进行。世俗化并不是中东穆斯林的主动选择,是西方的殖民入侵引入了世俗主义,迫使中东国家走上了世俗化进程。19世纪,英、法、俄等国对伊斯兰世界步步紧逼,奥斯曼帝国饱经屈辱,求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向代表先进文明的欧洲学习,实行大规模世俗化变革,成为众多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必然选择。西式教育的接受者成为世俗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在他们看来,要抵御列强入侵,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改造传统,推行世俗化。^{[3] 201}在阿拉伯世界,面对西方压力,世俗主义首先在知识界受到关注和讨论,并最终被政治家所接受。^{[6] 17-22}正是敌强我弱的现实促使第一代新型知识精英学习欧洲,把世俗化视为救亡图存的必经之途。

第二,政府自上而下强行推动,部分国家充满暴力色彩。中东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世俗主义思想仅仅为部分穆斯林所接受和拥护,以国家暴力为后盾、自上而下强制推动成为土耳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国世俗化进程的一大特点。情况通常是,接受世俗思想的政治人物通过革命或政变上台后,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大举进行世俗化改革,限制宗教力量的影响,反对者往往被国家机器所镇压。由于缺乏必要的说服教育,世俗化的强制推行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土耳其,以纳克什班迪教团为主的宗教势力发动的抗议活动或小规模暴动都被凯末尔坚决镇压。在埃及,纳赛尔执政期间(1952~1971年),穆斯林兄弟会于1954年和1965年遭受沉重打击,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成员被逮捕和处决。在伊朗,军人出身的礼萨汗漠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粗暴推行世俗化,流放反政府的乌里玛。在伊拉克,复兴党控制什叶派宗教界,打击不与政府合作的乌里玛,处死或逮捕多名宗教学者。在同样是复兴党执政的叙利亚,政府的强硬措施引发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力反抗,大批伊斯兰主义者罹难。^{[7] 368}

第三,世俗化的结果是宗教国家化。一般认为,政教分离是世俗主义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内容。在西方,美国确立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的标准与典范。任何宗教或教派作为社会团体不得干预政治,参与政府决策,而政府也不得支持或打击某一宗教或教派。换句话说,宗教与政治和平共处,互不干涉。但在中东,以西方为榜样的世俗化导致的政教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世俗化的结果不是政治与宗教的互不干涉,而是宗教机构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与在美国教会及其福利组织、教育和媒体等机构完全独立不同,中东国家多数宗教机构或协会都丧失了独立性,其活动一概受到政府的直接监控。比如伊玛目(清真寺领拜人)的任命,清真寺的开放和关闭时间等都由政府决定。^{[8] 148}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的拜谒规则和祈祷内容都由政府统一规定。

在压制宗教力量的同时,政府又利用宗教维护自身的统治。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自称是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的后裔,并把阿里的生日定为国家节日。纳赛尔执政之初在对外政策中特别强调伊斯兰教的作用,提出包括阿拉伯圈、伊斯兰圈和非洲圈在内的三个圈子的理论。萨达特上台后,自称为“信士总统”,强调国家的宗教色彩,放纵和扶植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势力,以牵制和打击左派。

在中东,世俗化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执政者个人权力的集中。“(中东的)世俗主义不是分离宗教与政治,而是使宗教服从于政治。”^[9]20世纪世俗化的变革使中东地区的国家、宗教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在古典伊斯兰世界,社会借助宗教保持自身活力,并一起对国家形成制衡。如今,伴随着世俗化,国家独大,宗教受其控制,社会随之而萎缩。由于此,在中东许多国家,执政者权力的扩大实际上与世俗化是同一个过程。由于中东世俗主义与其效仿的西方世俗主义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突尼斯学者理查德·噶努齐(Richard A. Ghannouchi)把前者称为“伪世俗主义”^{[10] 98}。

第四,历经反复与挫折,面临重重困难。伊斯兰教作为与基督教截然不同的一神教,其教俗不分的观念和强烈的入世性传统本身就是世俗化的极大障碍。因此,自19世纪起,推动中东国家世俗化的思想观念一直受到本土伊斯兰文明的抵制,乃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明显的“去世俗化”(Desecularisation)趋向。一是民间伊斯兰复兴持续发展。中东国家普遍出现民众向伊斯兰回归的现象,主动恪守宗教功课的人明显增多。二是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伊斯兰主义久经不衰。自1928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伊斯兰组织逐步成为中东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多数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最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即便在曾被视为世俗化改革典范的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影响也在稳步扩大。除这些温和的伊斯兰组织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极端组织企图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中东各国政府对内利用伊斯兰教增强政

权合法性,对外大力宣扬泛伊斯兰主义。2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主义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等所有世俗思想,成为整个中东最具影响、最富活力的意识形态。如果按照宗教对政治、法律和教育直接影响大小的标准衡量,中东毫无疑问是当前全球世俗化水平最低的地区。

近几十年来,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已成为困扰中东国家的一大难题。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对其而言是困难的抉择。近200年的世俗化经历充分说明,西方世俗主义思想的简单引入并没有根本解决中东国家的发展问题。对于有1300多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也无法简单地用“无世俗化,无现代化”这样的西方经验去要求。在总结伊斯兰世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埃斯波西托等学者认为,对现代化必须进行西方式世俗化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11]-12]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文明的共同目标,如何协调和平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之路,中东国家还需要艰苦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邱永辉,欧东明. 印度世俗化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2003

[2]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M].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3]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彭树智.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5] Fouad Zakariyya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M].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6] Azzam Tamini The Origins of Arab Secularism[M]// Azzam Tamini and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Company 2000

[7]吴云贵,周燮藩. 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Munir Shafiq Secularism and the Arab-Muslim Condition[M]// Azzam Tamini and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Company 2000

[9]Hakan Yavuz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Welfare (Refah) Party[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7(1).

[10]Rachid Aghhannouchi Secularism in the Arab Maghreb[M]// Azzam Tamini and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Company 2000

[11]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Azzam Tamini and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Company 2000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cularization of Middle East

LI Fu-quan

(The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8)

Abstract Secularization of Middle Eas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third stage is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1970s. Secularization of Middle East also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 is forced by foreign powers. Second, it is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compulsively. Third, the result of secularization i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Islam. Fourth, it is confronted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How to coordinate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the secularity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Key words Middle East; secularization; Islam; Turkey

(责任编辑 敬 军)